

乔万民
吴永喆
选注

欧阳修

唐宋八大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1264
157

乔石民
吴永喆
选注

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欧阳修 / 乔万民, 吴永喆选注.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2
(唐宋八大家)
ISBN 978-7-80696-361-6

I. ①欧… II. ①乔… ②吴…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①I26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6567号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

吴永喆, 乔万民/选注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88 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80696-361-6 定价: 19.00元

欧阳修生平及创作简介

(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四十岁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出生于庐陵(今江西永丰县)一个中下级官吏家庭。他父亲欧阳观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登进士第,但一生只在道州、泗州、绵州、泰州等地做过几任推官或判官。欧阳修在《泂冈阡表》中说:“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无一垆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汝父为吏,尝夜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夫养不必未,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由此可见,其父官虽不达,而心存仁厚,俸虽不多而廉洁慷慨,其母郑氏“恭俭仁爱而有礼”。父亲死后,郑氏带着他到随州去投奔在那里负责司法事务的叔叔欧阳晔,“依于叔父而长焉。尝奉太夫人之教曰:‘尔欲识尔父乎?视尔叔父,其状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欧阳修敬叔如父,欧阳晔也抚侄如子,给孤儿寡母以力所能及的照料和关怀。欧阳晔为人“严明方质,尤以廉洁自持。自为布衣,非其义不辄受人之遗。少而所与亲旧,后或甚贵,终身不造其门。其莅官临事,长于决断”。欧阳修评价他“明足以决于事,爱足以思于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洁其身”。

欧阳修幼年失怙,早期教学直接受之母亲郑氏。郑氏出身于江南望

族，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欧阳修的身上。家贫无力购置纸笔，她便以芦荻为笔，以沙土为纸，悉心教欧阳修习字学书，继而引导欧阳修诵读古人诗文。从而流传下来一段“芦荻学书”的教子佳话。

母亲的教导，环境的磨炼，促成了欧阳修的早慧，也使他自幼养成了吃苦好学的习惯。他惟读书是务，勤奋刻苦，家中无可读之书，便到邻居借阅，而每阅辄不忘，从而为成年后的文思勃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阳修后来回忆说：“州（随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兄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记旧本韩之后》）

当其少年之际，宋初的文坛充斥的是“骈四俚六”的所谓时文和号称“西昆体”的吟风弄月、软而无骨的呻吟诗。应当说，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所鼎力标举并身体力行的古文运动，对空洞无物而专以雕章琢句为能事的骈体文以强烈的打击，但由于后继乏人，致使古文经历了五代之后声势日弱，薄于息声，而骈体文却又死灰复燃。到宋初，甚至官文奏折书信策试，清一色的四六文。在韩文已被冷落在弊筐的情势之下，却遇到了欧阳修这样的知音。欧阳修将韩文反复诵读，细心揣摩，并与时文对比，感到韩文潮水般的气势和古雅纯正的文风无疑是沤烂的泥塘吹来一阵罡风，精神为之一爽，心胸为之开阔，他决心追韩愈的足迹，与之比肩而进。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六岁的欧阳修参加了随州的科举考试，试题为“左氏失之诬论”。尽管他写下了“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等为人称奇的佳句，却因为行文脱离了官韵而被黜免。四年之后，他赴汴梁应礼部考试，又没有考中。

天圣六年（1028），欧阳修带着自己的文章，去汉阳拜谒当时著名的翰林学士胥偃，并深受胥偃的器重。这年冬天，胥偃带着他北上汴梁。第二年的春天和秋天，欧阳修先后两次参加了国子监的考试，都获得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参加了礼部进士考试，而主持考试的就是名重一时的翰林学士晏殊，欧阳修再度夺魁。三月份，他经过御试，被正式录取在甲科第十四名。五月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天圣九年(1031),二十五岁的欧阳修来到西京洛阳任职。欧阳修所担任的推官,是西京留守的属官,负责掌管文籍,参谋意见,是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散职,而洛阳在当时又是天下文人所聚集的诗酒之地,所以,他一到任,并没有也不必汲于操劳公务,而是与友人闲暇遨游,流连美景,吟诗作赋。

洛阳是历史名城,而此时任西京留守的人是名重一时,且出身于王公贵族之家的钱惟演。钱惟演本人平生优游自处,富贵繁华之余喜欢吟诗作赋,颇有声望,而他又特别喜欢与当时的文人结交。欧阳修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中提到钱惟演时说:“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学仕至贵显,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属,适皆当世贤才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故此,欧阳修便“余本漫浪者,兹亦漫为官”,“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

欧阳修初到西京,便出于对仁宗的感激之情,写下了《会圣宫颂》,对仁宗在永安县修会圣宫,以“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的行为倍加赞扬。钱惟演是一个“西昆派”诗人,他和杨亿、刘筠等人曾互相唱和,将日常空泛无聊、吟花弄月所成的诗歌在大中祥符年间编成《西昆酬唱集》在士大夫阶层刊布。他们号称追慕晚唐李商隐的诗风,自诩其作品为来自西昆仙山的美玉,实则气格卑弱,不仅于世无补,反而在文坛吹过一阵令人体酥气短的浮华之风。欧阳修虽在钱惟演的属下,却并不苟同他们的诗风,也不像其他文人那样时常去钱府造访邀宠,而是寻求着气息相侔的文友。在这里,他结识了苏舜钦、苏舜元兄弟(前者为杰出诗人,后者为书法名流)、梅尧臣(诗人)、尹洙(古文家)、谢绛(文人)。他们与欧阳修地位接近,意气相投,在诗文创作等方面都主张革新而反对空洞浮泛之作。梅尧臣在《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中说:“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李迪、钱惟演、王曙)更保厘。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我于其间不量力。岂异鹏抟蒿鹩随。”在《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中又说:“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他认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唱和酬答之盛,可以和中唐元和年间元稹和白居易唱和的盛况相比肩。他

们这个文学集团正好和当时士大夫之间盛行的“西昆体”相抗衡。这些人才大气长，因而其诗文成就明显高于那些专事镂金错彩的文人。欧阳修在与苏舜钦、梅尧臣的交游中在诗歌艺术方面得到砥砺；而在与尹洙、谢绛的交往中，在散文艺术上又有很快的提高。《邵氏闻见录》记载，钱惟演在他的府第建起了双桂楼，在西城建起了临圆驿，他让欧阳修和尹洙为之作文以记之，目的在于比较二人文字功夫的高下。欧阳修先写完，但用字千余。而尹洙则说：“我只用五百字就可以了。”等到写成了，欧阳修很佩服尹记的简洁古朴之风。而《湘山野录》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欲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以上两篇文坛轶事，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欧阳修与同辈诗文作者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二是初步意识到了力求“简古”“完粹有法”，并力避“格弱字冗”等一些创作理论与方法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洛阳的三年，是欧阳修古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此时的文章尽管还未脱尽时尚铅华，尽管还未最终形成欧文的总体个性，却同样产生了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具备相当水平的作品。据统计，三年当中，他创作并流传下来的散文有三十余篇，诗歌有一百一十多首。散文中较为突出的有《杂说三首》《伐树记》《戕竹记》《非非堂记》《养鱼记》以及《洛阳牡丹记》等等。

王水照认为：“洛中三年对欧阳修的散文创作道路发生过一锤定音的重要作用。第一，编校韩集，写作古文……从此，古文成为他抒情述志、施展才华的理想领域，终生未渝。”“第二，崇尚‘道’的实践性性格……韩愈论‘道’，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伦理关系，高言宏论，神圣莫犯。欧阳修却强调‘切于事实’，突出‘道’的实践性性格，大大缩短了‘道’和人们的心理距离。”“第三，提高知名度，声誉鹊起，为日后主盟文坛创造条件。”“第四，孕育了他独特散文风格的胚芽……对洛阳盛游的追思，对今昔盛衰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已成为形成他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

(二)

景祐元年(1034)五月,欧阳修洛阳任满来到京都。六月被授为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主要从事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所藏图书资料的编校工作。这样,他来到了皇帝的身边,开始了他卷入政治斗争、屡沉屡浮的仕官生涯。

其实,欧阳修在此以前已初步撩开过政治斗争帷幕的一角,并体现出了他正直的品性和参与政治的热情。到洛阳的第二年(1032),他在《非非堂记》中说:“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勿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明道二年(1033),素享贤名的范仲淹被朝廷从陈州召进京都,官拜右司谏。欧阳修闻讯后即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情辞恳切地希望范仲淹别错过谏官进谏的良机。他一开始便谈到谏官的重要性:“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耳。”“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阶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中间又举唐代阳城为谏官七年一语不发,而后才“廷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的例子,认为谏官不应当临了才“一谏而罢,以塞其责”。最后又期望范仲淹“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可谓期之殷殷、责之切切。似乎从此开始,欧阳修的命运也就与范仲淹及其所推动的政治改革连在了一起。

宋朝建国之初,所推行的是比前朝更加彻底的中央集权制度。这虽然有利于巩固王朝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全国、发展生产,但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弊端:流民充军,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边患不断出现;为巩固其统治而形成的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导致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贪污腐化盛行,中央财政无谓损耗占很大比例;为加强财政而不断向农民搜刮,赋税徭役加之旱涝虫灾,农民大量流离失所,从而引发了农民起义和暴动。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代已十分明显地形成。来自中小地主阶级集团的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矛盾及其危害,力图通过改革王朝

政治来扭转被动局面，而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皇族、大官僚等守旧势力则要求安于现状。于是，一场新与旧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范仲淹由于反对废除郭皇后，并率众伏廷进谏而得罪了仁宗，被贬出知睦州，后来移知常州、苏州。景祐三年，他被召回京，充礼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此间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并明确指出哪些属于合理进秩，哪些属于私情冒进，哪些该留，哪些该黜。建议凡破例跃级提升官吏，皇帝应当过问，不应全交付给宰相一人处置，这得罪了当时宰相吕夷简，两人当廷激争，言辞不逊，而吕夷简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范仲淹被罢知饶州。吕夷简还觉得不解恨，派人将书有范仲淹引用朋党之意的文告贴在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宋史·范仲淹传》）。

欧阳修给高若讷的一封信是在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仅不为范仲淹一申其辞反而说范该贬的情况下愤而挥毫的。文章一开篇先说早闻高的大名，既而说听人所言高为贤人，君子，而后陈述对其“贤”与“君子”的疑问，接下来便是对高的讥讽：“夫人之性，刚果懦弱，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做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悯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不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盛怒之下，正气凛然，慷慨陈词，而又不乏抑扬转折之技巧。据载，该信在京城士大夫间广为传阅，以至辽国得这封信后还将它张贴在接待使臣宾馆的墙上，可见其影响之大。

欧阳修被贬出任夷陵县令。夷陵地处偏僻，远离京城，古代属于“夷狄”之邦，人民生活也因其封闭而较为贫困，是“小州”峡州治下的“下县”，

所以为官者都不愿来这里赴任，一旦来了，又很难有人来替换。但夷陵也有让欧阳修高兴的地方：风俗朴野，少盗争，当县令的每天可吃稻米和鱼，橘、柚、茶、笋四季不绝，而且江山秀美，足供游赏，况且欧阳修乐观豁达，所以，他到夷陵之后并不像许多遭贬官吏那样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在到任所之初给一位姓薛的友人写信说“罪人至此，为至幸矣”。同样的心情更详尽地体现在《夷陵至喜堂记》一文里：“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峡州）……三年夏……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与某有旧，且哀其以罪而来，为置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悴忧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在夷陵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安其土，乐其俗，除了与故旧通信，游山访水，便读书探赜，虽优游闲暇，而未尝忘却朝廷的政治形势，在《读李翱文》中感叹：“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羨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之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文章借李翱之忧而书自己之忧。在宋朝号称盛时而担忧西夏与北辽对宋的威胁，可谓忧之深而思之远！

景祐四年（1037），欧阳修内移任乾德县令，从偏僻的夷陵来到湖北的今光化县。第二年二月到任就职。当时，乾德正发生旱灾，他心急如焚地连写了两篇告天求雨的祷文。在祷文中，他没有将旱象归咎于山川之神，却归之于“吏之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气干于阳阴之和而然也”。随

后,尽管天降喜雨,他却在《答杨辟喜雨长句》一诗中抒发了这样针对现实的愤懑与忧思:“今之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如蜂。”

仁宗宝元年间,西夏首领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建都。并兴兵犯宋,朝廷为之震惊。康定元年(1040),宋王朝迫于形势,重新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夏竦、韩琦等人同管兵事。这时,范仲淹试图趁机召欧阳修掌书记(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一职),但欧阳修却回绝了范仲淹的美意。说:以前我支持范公,抨击吕夷简,指斥高若讷,难道是为了今天吗?“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体现了他坚持政治操守,不苟进退的胸襟与气度。

这年六月,欧阳修奉诏复职,回到京城重操旧业,担任馆阁校勘。三年之后,仁宗皇帝“方锐意太平”,“广言路,修政事”,不少人举荐欧阳修为人方正,宜为谏官。庆历三年(1043)三月,欧阳修被从滑州通判任上召还,正式充任太常丞知谏院;十月,又任右正言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这时的欧阳修,充分利用了与皇帝接近的便利,在一年多时间里,向皇帝进献了六七十篇奏议,大胆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这其中主要内容是揭露官场的腐败,指责当权者的徇私舞弊、不恤国事;主张改革吏治,选贤任能;要求选练官兵,加强战备,巩固边防;抨击保守派人物吕夷简、李淑等,并一再举荐热心政改的贤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在《论吕夷简札子》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纪纲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昭彰,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撻。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而在《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状》中热情洋溢地说:“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谓之千载一遇之难。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

在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之下,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副相),仁宗就朝政及时势等问题请范仲淹发表见解,范仲淹“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任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任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以诛废矣。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功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贍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繁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致于数变更矣。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实际就是政治改革的纲领，它涉及了选官任人、开科取士、发展农业、加强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虽不十分具体，但却切中时弊。欧阳修积极拥护并鼎力支持，他上书给仁宗说：“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与此同时，欧阳修还特别担忧地向仁宗提出：“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协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

功。”在欧阳修等人的促动之下，仁宗将这套政改方案交付廷臣辩议，而后颁行全国，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1044)八月，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路(今山西一带)察民情，筹粮草，并向朝廷提出垦荒的建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配合“新政”的推行。

不出欧阳修所料，新法推行惊动了朝廷中的一批既得利益者的美梦，他们同惯于因循苟简的保守势力迅速联合起来，向新政挑战，气势汹汹，软弱的仁宗便开始犹疑动摇，形势对新政很不利。

保守派所赖以打击革新派的杀手锏不外是恶语中伤和制造流言。他们指责范仲淹、杜衍、富弼、欧阳修等人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专擅朝政，同时散布流言说范仲淹有欺哄皇上的行为等等。欧阳修提笔写下了《朋党论》一文，予以驳斥，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他希望仁宗“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以达到天下大治。

正当斗争最激烈的时刻，边陲又出问题，宋军与西夏军队在陕西也交战了。范仲淹与富弼两人在朝争中有些灰心，于是请求到边境任职，范仲淹被任命为河东、陕西两路宣抚使。此后，韩琦、杜衍等也先后被罢去朝中要职，保守派当朝掌权，刚刚颁布不久的“庆历新政”各条款被一一废止。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在真定府得知范仲淹被免职外出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开篇便说：“臣闻事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相继指出，小人“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废。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在历数杜、范、韩、富等人的政绩之后，

又感叹道：“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

欧阳修作为革新派的重要人物，自然不会被放过，轮到他时，对手的手段却让他有口难辩，欲诉无门。首先，他们派人模仿欧阳修的笔迹伪造书信，说欧阳修离间皇家之间的关系，被欧阳修驳斥后，仁宗也解除了疑窦。后来，他们使出了更毒的一招。

欧阳修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娶欧妹之前与前妻生一女儿，张龟正和欧妹去世之后，这个和欧阳修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外甥女张氏便被欧阳修收养，后嫁给欧阳修远族的侄子欧阳晟，但不久前张氏与仆人通奸，事发后被下开封府狱，张氏的财产被查抄，其中张氏有一张地契上加盖有欧阳修的印戳。如此一来，必欲置欧阳修于死地而后快的朝中掌权派便以为有机可乘。首先，身为谏官的钱明逸将流言与想象之事综合利用，诬告欧阳修与甥女张氏犯奸，又据地契上印有欧阳修的印戳来确定欧阳修侵吞他人财产。他编织的这些“罪名”又被当时任御史中丞的蒋之奇利用，于是，朝廷要求追查，欧阳修被下开封府审讯。

莫须有的罪名以及对欧阳修正直人格的侮辱，激怒了欧阳修，他在被审中先后八次给仁宗写信，要求皇上予以察辨：“圣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当陛下圣政惟新之日，使执政之臣守阙号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恶名不可虚受，将不得以而为之，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臣无任恳血哀号激切之至。”（《再乞辨明蒋之奇言事札子》）素以风节自持，其德行品格气节为朝野素所钦羡的欧阳修，却被人诬以“禽兽不为之恶”（同上），欧阳修的愤怒可想而知。在欧阳修的一再请求之下，皇上请蒋之奇、钱明逸等人查明实情，结果是“券既弗明，辩无所验”（《谪滁州制诰》），此案数月后草草了之，于是蒋之奇被罢职出朝，而欧阳修也因此被革职，贬为滁州“太守”。

（三）

庆历五年（1045）九月，欧阳修从河北真定府启程，赴滁州任。

滁州是处于长江与淮河之间一个偏僻而较闭塞的所在，在五代之地这里曾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而今却山明水净、林壑幽美，景致宜人。作

为文人的欧阳修到此任职，正好寄情山水，放情诗酒，从而掩盖此前的痛苦，所以，他治滁之间，不图赫赫之功与煌煌之名，事事循宽就简。在给好友滕子京（宗谅）的一封信中说：“人事之多端，劳生之自困，可为叹息，何所胜言……”滕子京在信中曾鼓励他“恤民瘼，宣布诏条，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欧阳修在称颂一番之后回复说：“旧学荒芜，文思衰落，既无曩昔少壮之正气，而有患祸难测之忧虞。”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次遭贬与初贬夷陵之际心态已有很大不同，他故意写山水花鸟，故意放浪诗酒，年逾四十而号称“醉翁”，其实是在极力以“风流太守”的面孔来遮蔽内心的痛楚，是一种对政治斗争和人世风波的逃避。他写出了“鸟飞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丰乐亭游春》）“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题滁州醉翁亭》）“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独醒然”（《啼鸟》），不仅要极力忘却现实的一切，甚至埋怨起屈原来了。

这时期的散文《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已不复往日责范司谏、斥高若讷时的凌厉机锋和进取之气，而代之以悠然自遣，泰然自若，物与我相融相忘的消而不沉的意绪。从而形成了“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的风格。

悠然自处不等于不问时政，流连诗酒也不等于就此麻木不仁。庆历五年的七月，欧阳修的好友石介，受夏竦等人的迫害，病死在家中。石介字守道，山东徂徕人，为人耿直仗义。庆历中，他积极拥护革新，曾写下《庆历圣德诗》来歌颂新政、推崇庆历君子，而指斥吕夷简、李淑辈为小人。因此，深为朝中保守派嫉恨。石介死后，有传言说他并未死去，而是潜逃到北国。保守派借此兴风作浪，要求斫棺验尸，以图借端株连，把革新派一网打尽。欧阳修闻讯后，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在庆历六年的一个秋夜，他打开石介的遗文集子，睹文思人，泪如泉涌，百感交集，一气写下了三百五十字的五言古诗《重读徂徕集》，明确肯定了石介所发议论是“切切善恶戒，丁宁仁义言”。坚信历史终会对忠奸、真伪还以本来面目：“谗诬不须辩，亦止百年间。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他还要“下紆冥冥忿，仰叫昭

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将石介的冤屈刻于天地，昭示鬼神。这首诗与其平日的优游儒雅之态可谓大异其趣，简直是要目眦尽裂了，可见“醉翁”乃佯装，而内心深处的隐痛并没有消除，胸中仍鼓荡着正义的难平之气。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奉诏徙知扬州。北宋时代的扬州，是东南重镇，处于水运枢纽位置，大运河纵贯扬州，使这里从隋唐以来便成为繁华的都市，商业贸易发达，商贾文人聚集，使扬州成为一个经商赚钱的所在和吟诗作赋的乐都。欧阳修被移知扬州，是明显的带有升迁意味，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感到多么兴奋。庆历新政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韩琦曾在这里主持工作，而欧阳修承其余绪，也敬其为人，又加之锐气已不如当年，所以，他只是谨守前任留下来的一切，多以谨慎守成为职。每日栽花种柳，于平山堂与友人、文学爱好者及当地显达聚会，日子平淡，但也逍遥。心境渐趋平和，无奈多于有争，四十二岁，头发已渐花白，耳目之功都有所减退。在此前后，洛阳时期的好友，后来也一直诗文上相唱和，政治上相扶翼的尹洙、苏舜钦都因遭政治风波而过早离世，欧阳修的精神、心灵因过多的痛苦和磨难已变得悲伤多于激愤，虽在《祭尹师鲁文》和《祭苏子美文》中有“世之恶子之多，未必若爱子者之众，而其穷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的呼号；有“嗟世之愚，掩抑毁伤，譬如磨鉴，不灭愈光。一世之短，万世之长”等的激情勃发，愤世嫉俗之言，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平静而谨严地对待人和事。

扬州虽美，但并不适合欧阳修，这里政务繁忙，交际过多，使他有应接不暇之叹。他知道，离此不远的颍州是个风景秀美，地偏事简之地，所以他上书请求罢去扬州之职，改移颍州。他的意愿得到满足。皇祐元年(1049)他来颍州赴知州之任。这年三月十三日到任，他在《颍州谢上表》中说：“伏念臣材能浅薄，性识昏蒙。偶自弱龄，粗知学古，谓忠义可以事国，名节可以荣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怨仇；退未知补教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晴瞳虽存，白黑才辨。盖积忧以自损，信处世之多危。”除此之外，虽然朝廷在知颍州的同时又加给他礼部郎中、知制诰，复其龙图阁直学士称号，仍不见其有多么兴奋，而在谢表中也屡提类似“一遭毁谤，欲辩

无由，少忤要权，其祸不测……罔极之谗交兴而并进，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颠？”的言辞，谤毁之伤隐隐作痛，而眼下又头发花白，耳渐不聪，目亦昏花，所以，他隐然有了退身之念。颍州位于今安徽阜阳。城西有大片清幽而别致的水面，称作“西湖”。这里“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桥画舸通”。夏季藕定绽放，小舸往来，鹭鸟翔集，游于其间别有意兴。欧阳修喜欢颍州的小巧玲珑，也喜欢“西湖”的碧波澄静，每当他与友人游于湖上，雾里看花般地欣赏着这里的一切时，总要兴之所至留下诗篇，觉得颍州是他辞官归隐之后的理想场所。在后来所写的《思颍诗后序》中说：“予自广陵（扬州）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而有终焉之意也。”一年以后，他又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宋时为南京），在写给好友梅尧臣的诗中也说：“壮心销尽忆闲处，生计易足才疏畦。”决定在颍州的西湖之旁置办房舍，以备退后久居；甚至约梅尧臣一同来颍州安度晚年。

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的母亲病故，他从应天府任上赶回颍州守丧，第二年八月扶柩回吉州安葬。十月复回颍州居住守志。这期间，朝廷有起用旧臣之意，但因欧阳修“固辞”而作罢。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服丧期满，在朝廷的催诏之下启程返回了汴京。

（四）

从庆历五年被贬出京城，历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数任，而今又回到天子脚下，已是整整九个年头。九年当中，朝廷政治变化不大，但庆历旧臣却各自东西，命运淹蹇。当四十七岁的欧阳修以满头白发面对仁宗时，仁宗不免有些惻然，关心地问欧阳修年龄几何，都在哪些地方辗转漂泊，饮食起居是否正常。欧阳修要求继续留任外官，没被批准，随后被任命负责考核幕职州县官以下的官员任职情况。

因为这一职务可决定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命运，因此握有相当的实权，所以招致朝中小人的猜忌。他们担心欧阳修一旦得到重用会威胁自己集团的利益，于是殚精竭虑地排挤他，企图在他立足未稳之际让他再度下台。出于恪尽职守的愿望，欧阳修先后上了《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和《论臣僚奏带指使差遣札子》，指出：“待阙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住京，动经年岁，遇有合入阙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